

Research on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央文献 外译研究

理论与实践

修刚 田海龙 / 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Research on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央文献 外译研究

理论与实践

修刚 田海龙 / 主编
陈勇 李钰婧 / 副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央文献外译研究: 理论与实践 / 修刚, 田海龙编
著.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124-2823-2

I. ①中… II. ①修… ②田… III. ①文献—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9067 号

中央文献外译研究: 理论与实践

作 者: 修 刚 田海龙

出 版 人: 刘小龙

出版统筹: 邓永标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舒 心

责任印制: 秦 赟

出版发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100191)

电 话: (010) 82327034 (总编室) (010) 82317023 (编辑室)
(010) 82317024 (发行部) (010) 82316936 (邮购电话)

网 址: //www.buaapress.com.cn

读者信箱: bhpress@263.net

印 刷: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若本书有倒页、脱页、缺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23170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一）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新中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率领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同志率领我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中国人民融入了世界发展大潮，走上了国富民康之路；习近平同志率领我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大国强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此时，解决“挨骂”问题、构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之任务的迫切性也日益凸显出来。

“话语”一词，最早可溯源于文化语言学。当今时代，话语往往传递表达着特定的价值观。从国际话语角度来论，话语主要是指通过其话语所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因素所产生的国际作用影响力。从意识形态来看，话语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神经。话语权背后隐含着国与国之间地位、实力的角逐，记录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竞技。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话语体系是反映话语主体的价值、利益与权利的意义表达系统。

从国家话语来看，中国话语本质上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修刚教授、田海龙教授主编的《中央文献外译研究：理论与实践》就是一本体现中国话语的现实文本，它与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步伐相合

拍，这部论文集不仅代表了目前我国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方面的前沿水平，还是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研究基地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中央文献术语外译词典（中英、中俄、中日）编纂的理论与应用研究》（14AYY003）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时代意义。

近年来，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本论文集是在外交部、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外文局等单位的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收录了国内学者2012—2017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中国外语》《对外传播》《探索与争鸣》及《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的28篇代表性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梳理了中央文献外译研究的最新成果，厘清了中央文献外译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明确了新时期中央文献外译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论文集的理论篇部分共收录了15篇学术论文，一部分学者专注于中央文献外译研究中宏观上的理论建构、范式探究、路径探索，如：陈明明（2014）提出了在党政文件翻译中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几点建议；黄友义、黄长奇和丁洁（2014）从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建设机制和顶层设计、政治话语翻译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方面探讨了党政文献对外翻译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贾毓玲（2015a）以重要概念的翻译为切入点，分析了外宣工作中文化差异的重要性；田海龙（2017）从超学科的视角探索了中央文献英译研究的新范式。

还有一部分学者以中央文献外译的实践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层面为中央文献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如：唐义均（2012）从词语搭配的视角调查了党政文献汉英翻译中的搭配冲突，指出这样的冲突导致译文失去了部分信度与效度；朱义华（2012）通过“争议岛屿”事件分析了外宣翻译工作中的政治意识；王平兴（2014）探讨了新华社时政翻译实践中的政治考量问题；童孝华（2014）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翻译

实践为基础,强调了翻译的主体意识;王刚毅(2014)结合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翻译,提出政治文件翻译应采用“忠实+灵活”的翻译策略;贾毓玲(2015b)通过对《求是》英译的解析,从话语构建和话语翻译两个角度阐明,提高原文的外宣适应性和译文的连贯可读性为路径,构建国际社会能听得懂、易理解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王斌华(2015)以翻译中的评价为研究内容,探索了批评翻译学的实证路径;窦卫霖(2016)以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解析了提高中国时政话语对外传译效果的途径;汪洋(2016)对《政府工作报告》英译进行了历史研究,指出英译策略趋于灵活有利于在忠实于原文与适应目标语读者之间取得平衡;刘宏伟(2017)以“中国梦”英译为例,解析了政治术语文化传播中的语境依赖性;杨平(2017)通过与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鲍川运教授的访谈,讨论了“中国关键词”对外传播的重要性与路径。

论文集的实践篇部分共收录了13篇学术论文,从政治文本的英译、日译、俄译三个不同语种的翻译实践中,追本溯源,举一反三,探究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中的机遇与挑战。

英译实践研究主要包括:石蕊(2017)基于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划分理论,解析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英译中表达型文本功能实现的路径和方法,强调了文本功能对政治文献的翻译策略提供了理论可行性和实践操作性;尹佳(2017)基于批评话语分析有关话语即社会实践的论述,以英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过程中的相关资料为分析语料,讨论了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能动作用;陈勇(2017)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过程为参考,探讨了翻译与再情景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翻译再情景化的分析模式。

日译实践研究主要包括:修刚、米原千秋(2016)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日译为例,探讨了中日政治文献“同形词”的翻译策略,指出应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信息放在中央文献外译工作的首

位，充分考虑跨文化交际的需要；鲍同、蒋芳婧（2016）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建国后65年日译单行本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总结了时代特点与对外翻译、传播经验，为我国的外宣工作提供了借鉴；蒋芳婧、段东海（2016）基于德国功能翻译学派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原则，对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李钰婧（2016）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为语料，解读了政治文献翻译中“融通中外的新表述”的内涵与外延。

俄译实践研究主要包括：王铭玉、刘子夜（2016）以2013—2014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俄文版与俄罗斯国情咨文为语料，借助词频统计手段对其进行了量化分析与对比研究，从词频量化角度对我国政治文献汉译俄问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姜雅明、李梦雅（2016）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俄译本的分析，探究了中央文献俄译本语句结构的特征；刘甜甜（2017）结合功能语篇分析的显化分类，解析了中央文献俄译中的显化现象，指出了中央文献俄译显化的重要性；肖德强（2017）在科米萨洛夫的翻译对应理论框架下，分析了习式话语中俗谚语的俄译翻译等值对应问题；王晔（2017）通过对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俄译本的对比分析，批判性地运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陌生化理论，考察了陌生化手法在政治类文献翻译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揭示了政治翻译活动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美国学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法国后现代学者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利。”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为新时期外宣工作提出了重要任务：“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作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智库的学者，作为工作在教学与科研一线的教师，修刚教授、田海龙教授兼收并蓄，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组稿成集，以飨读者，可谓用心良

苦。为此我们感谢两位教授以及各位作者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工作做出的杰出贡献。

是为序。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

序言（二）

2018 年春节后，田海龙老师来函，邀请我给他和修刚老师主编的著作写序，再三推辞后，还是应允下来。之所以推辞，主要原因是我是翻译外行，写序会贻笑方家，甚至殃及编者。应允下来，则是因为自己近年来负责中央编译局的中央文献翻译部工作，亲身参与了多项政治文献的对外翻译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一些粗浅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外宣的政党。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被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延安时期党中央开始较为系统地组织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翻译成俄文。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全面及时地了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党和国家建立了多家专门从事对外翻译和传播的机构，通过组织翻译《毛泽东选集》，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翻译队伍，形成了一套至今依然泽被后世的翻译原则、翻译流程和翻译策略。

我所在的中央文献翻译部的前身就是在翻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于 1962 年建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改革开放以来，改称为中央文献翻译室，承担的工作内容不断充实。除了翻译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外，从 197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主持翻译党代会文件；从 1978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起主持翻译人代会主要文

件。此外还翻译党中央全会文件、全国政协会议文件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文件。语种从最初的英、俄、法、西、日五个语种,增加到英、俄、法、西、日、德、阿等七个语种。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中央文献部已经成为国内从事政治文献翻译的主力军,培养了一支主要语种完备、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翻译队伍,建立了一套分工合理、管理科学的翻译流程,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多语种翻译成果,淬炼出“无私奉献、精益求精、勇于创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黄坤明同志的评价)的中央文献翻译精神。

近年来,按照中央领导提出的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的要求,我们在完成好常规翻译任务的同时,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翻译和传播。先后翻译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等著作,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十九大文件翻译工作。

长期以来,许多领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都存在着脱节的现象,中央文献翻译和研究也不例外。加之,参加翻译实践的人员有限、翻译过程有特殊要求、政治文献读者有限等多种原因,中央文献翻译的实践活动只停留在西斜街36号院里,大量凝聚了几代翻译人心血的高质量翻译成果译后就束之高阁,许多在翻译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方法策略、技巧手段只能在自己的团队内传承。这大大限制了翻译成果向研究成果和教学成果的转化,既影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社会知晓度,也大大弱化了其社会价值的发挥。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更加迫切需要全面了解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发展经验。每次党和国家有重大活动后,一些国外同行都会问你们是否有相关文件的译文。当我把同事们辛勤完成的译文转发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除了表示感谢后,更赞叹译文的准确达意、语言地道。显然,高质量的政治文献译文是国

际社会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基础性材料，政治文献对外翻译也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性工程。

我们深知，在构建大外宣格局的新时代，中央文献翻译被赋予了参与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职责。对外翻译不仅是语言工作，更是政治使命。因此，要更好地发挥中央文献翻译的作用，就要切实提高翻译工作的开放性，拓展深化与学术界、外宣实务界以及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合作，将中央文献翻译融入到整个国家的翻译事业中加以推动，提升到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高度进行谋划，置于全球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开展实践。

从2011年开始，我们陆续与天津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开始探索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数据库建设等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例如我们与天津外国语学院共建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共同培养博士、博士后等人才。在我的同事的参与和指导下，一些博士生、博士后增强了问题意识，激发了研究灵感，在中央文献翻译历史、理论、翻译成果传播等多个领域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取得了高质量的成果。这些成果反过来也给译者提供了重新审视自己工作的视角，增强了他们进一步做好翻译工作的自信。此外，我们还联合创办了“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至今举办了三届，成为扩大中央文献翻译影响，推动相关研究，交流研究成果的高端平台。这些工作正在发挥着促进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共同提升相互水平的作用。

在这本论文集中，我欣喜地看到，既有一些长期支持中央文献工作的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也有我身边同事对自身工作的理论思考，还有我们培养的博士生、博士后的最新成果，更有一些尚未谋面的专家学者的启发性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章体现了目前关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最高水平。

客观地说，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依然是一块充满希望的处女地，有着大量需要开拓深耕的空白。比如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翻译成果对外传

播研究、中央文献翻译的策略技法研究、各国政治文献对外翻译比较研究、政治文献译文与原文的对比研究、大数据技术在翻译中的应用研究、翻译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等。

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关注和参与到中央文献翻译和研究之中，以及更大范围的政治文献翻译和研究之中，在翻译和研究的良性互动中探索语言与政治的关系，共同提升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的水平，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是为序。

杨雪冬

2018 年春于北京西斜街 36 号

推进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代序）

习近平总书记^①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2015）。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显著提高，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世界上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甚至国家形象屡屡遭到刻意的丑化”（陶文昭，2017）^②。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还未达到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程度。推进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是解决“挨骂”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

建设中国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关键是能否构建起能够使外国受众接受与理解的话语体系。习总书记提出要建设一个“融通中外”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顾名思义，该话语体系并不单单是传播者自己的话语体系，而更应该是一个能够使外国受众容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如果在翻

①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5年第9期。

② 陶文昭：《“穷”与“达”：中国话语权的辩证法》，《北京日报》，2017年1月9日。

译的范畴中讨论，那么我们的译文应当能够被听我们说话的人理解，要能够让他们领会我们最想说的、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埋头翻译半天，对方仍然不明白；或者我们自认为翻译的很清楚，但是外国受众无法像理解本民族的语言一样去理解我们的译文，这都达不到融通的目的。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当外国受众读了我们的译文后，他们能够像理解自己的社科文章、政论性文章、讲话等内容一样去理解我们翻译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的形式要与内容密切结合。用受众文化范围内认同的传播方式，传达我们的内容，即用翻译对象国受众所自然接受的最佳形式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文化。

因而传播途径与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若传播好中国声音，就需要采用让外国受众适应、易于理解的表现形式，即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具以“比喻”的翻译为例，汉语中有一些比喻在外语中并没有，如果在翻译中无视表述习惯差异，强行在译文中照搬我们的意象代指，那么受众就很可能因为这样的表述而产生理解障碍。比如在汉语中，当我们想表达“愚蠢”这一含义时往往会用猪来比喻，但“猪”这一意象在日本受众的认知中，首先是“不干净、懒”的印象，“愚蠢”并非排在首位。同样，代指“愚蠢”的动物意象在西方一般会用“驴”或其他动物来表述，那么我们在翻译时就要适应对方的比喻说法。即传播中各国声音不仅要传播内在的内容，同时在外在上也要选择受众能够接受的形式。

在各类文本中，最能直接体现“中国特色”的声音当属中央文献。在翻译中，无论是中央文献还是其他政论性文章，再或不同类型文本的翻译，它们的核心都是“翻译”这一行为。既然是“翻译”，那么就需需要跨越文化之间的障碍。翻译中存在着两种障碍，一个是语言障碍，一个是文化障碍，只有同时跨越了这两个障碍，才能够实现翻译目的。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央文献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是完全一样的。并且，恰恰

因为是代表着中国官方声音的中央文献，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就更加需要重视跨文化交际。因为我们领导人讲话时面对的是中国受众，而并非专门面向国外受众去讲的。所以在讲话中引用的各种中国受众容易理解的习语、俗语等，都是为着让中国受众更加清楚地理解讲话中的思想与价值观。当我们把这些内容翻译成外语时，面对与我们背景不同的外国受众，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既能生动形象地体现中国语言特点，又能跨越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所以在处理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上，绝不会因为中央文献的严肃、正式性，其中跨文化交际障碍就会减少。只有我们把这些语言生动地翻译给外国受众、跨越文化障碍，才能使他们更加了解中央文献的内涵所在。

另外，在中央文献的翻译中，意识形态是必须高度注意的问题，但它并非是指导翻译的唯一准则，因为跨文化交际同样不可忽视。作为中国的官方文献，我们在翻译中央文献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动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为了收到理想的译介效果，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核心往往不在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翻译上，而是在于“表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语言”上。译文影响外国受众理解的因素往往来自文化障碍，如果我们把这些障碍解决掉，建立起国外受众能理解的话语体系，他们就能更加正确、容易地理解内容。所以，意识形态可以引导翻译的总体方向、助力翻译目的的实现，但是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却不可成为左右翻译策略的最高准则甚至唯一准则。

说起跨文化交际，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些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如中国人结婚突出红色，日本人结婚突出白色等等。在中央文献翻译中除了这些“显性障碍”，还存在许多其他因为对文化的不了解而产生的障碍，比如对中国的政体、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等不了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中很多中国特色词，如“生产大

队”这个词，如果不了解中国那段特殊时期的话，受众就不知道生产大队是什么，大队长是什么。再比如我们的“医保”具体指什么，是如何实施的；我们的分配制度、所有制等等，这些内容都是跨文化交际翻译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外国受众在理解我们的话语体系上还存在这一些障碍，那么就更需要我们跟对方讲明白、说清楚了。我们要使外国受众了解，不同文化对于同一种事物的看法可能不同，但是这并没有谁对谁错，因为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的即是有原因的。并且，中央文献的主要翻译目的并非是向外国受众“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等思想内容，而是向世界展现我们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成果，从而树立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

如今，翻译研究的领域在逐步扩大，翻译行业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其受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同样，中央文献的翻译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如每年的“两会”翻译都会引起热议，习总书记系列著作的出版与翻译也一直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自从十八大以来，我们政府以及党的领导人都特别重视中国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习总书记也明确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对外翻译又迎来了一个春天。当前中央文献翻译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快”。我们可以参考以前的翻译工作，比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的翻译都是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习近平系列讲话等著作中文版一出现，相关译本就立刻跟了上来。

第二，我们重视翻译理论的研究，并利用这些研究去解决翻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我们意识到了不同的文本在翻译策略、翻译思想上的不同。中日翻译研究中或许少一些，但是在中英翻译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和研究者都在积极运用一些翻译理论去思考、解释中央文献翻译中的问题。

第三，我们加大了对于译文受众的研究。比如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

文献翻译基地的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同学都致力于研究受众对于某些语言现象、翻译现象的看法，这些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现行的中央文献翻译中还是过于强调忠实原文，而忘记了翻译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倾向，而并非全部都有这种问题。我们好像宁愿让译文生僻一些，宁愿让受众对其敬而远之，也不敢在跨越跨文化交际障碍上越雷池半步。我认为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忠诚”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它不主张对原文的一味“忠实”，而是强调翻译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协调。“忠诚”不只是对原文、原作者忠诚，同时也要对受众忠诚。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进行借鉴与参考。

第二，翻译的渠道还是偏少。拿中译日为例，当今的译文要么来自于部分网站，要么来自于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国家部门，而其他相关的翻译机构并不多。但是翻译只有在诸种译文之间不断切磋、完善中才能不断提高。如果能有很多不同力量来翻译，我们就能在译文的相互借鉴、参考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而更好、更快地构建起“融通中外”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第三，当前也存在着如何用好大数据来解决翻译中的新词、用语等问题。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更新与变化，适应信息的需求，并且将信息为我所用，以先进的技术指导、助力翻译，则能够加强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第四，我认为在翻译研究当中，我们往往喜欢强调不同翻译理论的个性，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相互衔接、传承的地方。具体到翻译实践中也是同样，不可一味强调中央文献其本身的特殊性，而是既要注重创新，又要注重传承，从而使翻译工作进行地更好。

以建设中国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为目标，我们在相关的翻译理论